

甲午战后的《盛世危言》热与郑观应的爱国思想

赵璐

提要 郑观应是近代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他1894年著成《盛世危言》。本文针对甲午战后所形成的《盛世危言》热,认为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该书顺应了时代潮流,是作者爱国思想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 郑观应 甲午战后 《盛世危言》热 爱国思想

郑观应,近代中国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他所著的《盛世危言》,不仅阐述了变法维新思想,而且也是他爱国思想的集中体现,在中国近代曾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尤其是在甲午战后形成了一股《盛世危言》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早在1891年,郑观应就基本写成《盛世危言》,并于1894年春刊行。甲午战争爆发后,他时刻关注着战局,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但是,甲午战败使中国陷入“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的境况,朝野上下笼罩着惊慌、痛惜、失望的愁云,举国上下莫不惊呼“中国之将亡于旦夕”。为了救亡图存,郑观应重新修改并刊印了《盛世危言》,他说:“今中日战后,时势变迁,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距作书仅年余耳,而事已迥异,故未言者再尽言之,已数易其稿。……以期草野咸知,及时兴起,免成风痹不治之症”^①该书以其真挚的爱国激情,丰富的变法主张,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和赞誉。

1895年3月26日,江苏藩司邓华熙将《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荐给光绪皇帝,他在奏折中说:“臣阅候选道郑观应所辑著《盛世危言》一书,于中西利弊透避无遗,皆可施诸实事。”^②4月20日,光绪帝批示:“知道了,书留览”,并命总理衙门刷印两千部散发给大臣们阅看。邓华熙调安徽巡抚后,于1897年、1898年又两次向皇帝推荐该书。1898年,光绪帝师傅、曾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等职的孙家鼐再次将《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帝。1898年2月,光绪帝师傅、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告诉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经与孙尚书先后点定进呈,并邓中丞所上计共三部。今上不时披览,随后必当有内召之旨。”

《盛世危言》不仅引起皇帝的重视,社会上层人士对此反映也很大。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任天津海关道职的盛宣怀对此书颇为赞赏,他致书郑观应,说:“承赐《盛世危言》四部,展诵之下,万分钦佩。我国家果能痛定思痛,发愤有力,目前割地偿费,虽吃巨亏,犹可以为善国。如再游移敷衍,不能用人,恐各国从此生心,偏安之局吾辈眼中尚见此情形也。弟拟将大著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乞再分寄二十部。如能因此一开眼界,公之功亦巨矣。”后盛宣怀又致书郑说:“《盛世危言》一书,蒙圣上飭总署刷印二千部,分散臣工阅看,倘能从此启悟,转移全局,公之功岂不伟哉!”可见,盛宣怀把《盛世危言》的作用看得很重。清末洋务派首领、两江总督张之洞把《盛世危言》与当时论时务的书作了比较,认为“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他赞扬该书:“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③1896年,翰林院编修蔡元培也赞扬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郑观应集》(上册)第2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

② 《头品顶戴江苏布政司布政使臣邓华熙跪奏》(《郑观应集》上册,第226页)。

③ 见夏东元《郑观应传》,第65—7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11月第2版。

《盛世危言》是“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①《盛世危言》出版后，社会反响确实很大，曾经轰动一时。郑观应自己排印的五百部，很快求索一空，求者犹络绎不绝，不得不一版再版。1895年就出版了4种版本，1896年上海书局一家就石印了3次，1897年又出版了3种版本，1898年竟达7种版本之多。有人估计，《盛世危言》的版本约有20多种，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较多的一种”。^②《盛世危言》几经增订，反复印行，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畅销的几种书之一，被誉为是启迪思想、统筹全局的名著。连外国报纸也敏感地指出《盛世危言》“所载中外各事，中华人近以该书作南针，迩来场中考试常出该书所序时务为题目。”^③

甲午战后出现这样的《盛世危言》热，主要是因为该书内容适应了时代要求，具有极强的爱国主义精神。《盛世危言》刊印时，正是甲午战争民族危机严重和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兴起之时，郑观应基于救国救民的立场，抱着不为外人所欺的目的撰写了此书，提出了救亡图存和发展资本主义两大任务。特别是他的爱国思想，是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要求救国救民这一根本的实际需要紧密联系的，是顺应时代潮流，合乎人民需要的进步思想，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他的爱国思想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抵御外侮，实现民族独立。

郑观应面临自两次鸦片战争以来逐步加深的民族危机，对外国的侵略无比愤慨。早在19世纪60至70年代刊印的《救时揭要》中，他就曾揭露外国贩卖鸦片、掠夺人口、夺我利权等罪行。后在80年代刊印的《易言》中，他又进一步揭露列强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及通商、传教等罪恶，明确提出“取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夺其所恃”^④的主张。而在90年代刊印的《盛世危言》中，他“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⑤要求抵御外侮、实现民族独立的爱国思想更为强烈。

郑观应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藩篱尽撤，强敌四至，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抵御外侮。他说“当今之世与古昔情形不同，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⑥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他揭露了日本的侵华罪行，“日兵残杀、奸淫、掠劫，与野人无异。……若徒事残酷，遇屋则烧，遇人则杀，良非治道，必为万千世人唾骂。”^⑦认为中国“犹不亟讲求兵备，力图自强，即欲求为贫弱而不可得，又安望能洗丧师之耻，复失地之仇哉！”^⑧说明抵御外侮在当时是非常迫切的。

如何进行防御，他主张大量加强海防和边防，他说：“防海于昔日易，防海于今日难。昔日之舳舻楼船，不敌今日之铁甲飞轮冲风破浪也。”^⑨为此，他重视海军的建设，即使到甲午战后有人主张不必花钱重建海军时，他还是强调重建海军，认为“闭关自守患在内忧，海禁宏开患在外侮。内忧之起，陆军足以御之，外侮之来，非海军不足以御之。”^⑩要求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同时，他也注重边防，尤其在甲午战后，边患形势日益严峻，郑观应在其增订的《盛世危言》十四卷本和八卷本中，将《边防》从上、中、下三篇增加至九篇。他说：“今日之中国防务，防

① 高平叙《蔡元培年谱》，第8页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② 参见《郑观应传》第3页，第265—269页。

③ 见夏东元《郑观应传》，第65—70页。

④ 《易言三十六篇本》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63页。

⑤ 《盛世危言自序》，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33页。

⑥ 《盛世危言·民团下》，《郑观应集》上册，第903页。

⑦ 《盛世危言·练兵下》，《郑观应集》上册，第871页。

⑧ 《盛世危言·海防下》，《郑观应集》上册，第263页。

⑨ 《盛世危言·海防上》，《郑观应集》上册，第754页。

⑩ 《盛世危言·海防下》，《郑观应集》上册，第762页。

海犹可以缓,防边实为要图”,这是因为“海属外,陆属内。大海旷邈无垠,陆则有物产,有城池,得寸则己之寸,得尺则己之尺,故陆路为天下所必争,即边防为兵家所极重。”^①

要加强海防与边防,就要练兵。他指出“兵在精而不在多”,中国仿西方练兵十余年,仍没有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将帅非武备学堂出身,未谙韬略,又无胆识,惟延西人教习口号,步伐整齐、枪炮命中而已。”^② 他要求编练民团,“务使人尽知兵,可备征调,何忧外侮?”“使民兵庶足以助官军,”^③ 协助官军御敌。

对于外国列强,郑观应认为都应该防御,并且主张重点防俄。他对沙俄的侵华野心,早有警惕,指出“俄人贪而无信,天下莫不知之”,^④ 从而主张“防俄宜先”。^⑤ 为不使祖国的万里山河拱手让与沙俄,他主张移民实边,同时主张在外交上联英日以拒俄,到甲午战后,他鉴于国势危急虽曾提出过联俄以拒英日的策略,但最终目的则是要“籍俄以与日和,籍日和英以拒俄。”^⑥

郑观应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以及团结和武装人民一致对外的思想,无疑是爱国的和进步的。

二、实行商战,致富求强。

郑观应不仅主张反抗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还主张反抗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他认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比武装侵略更具有危害性:“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帝国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其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商品倾销,“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⑦ 因此,就必须扬弃“农本商末”的封建经济传统,发展国民经济,实行“商战”。

郑观应指出:“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⑧ 商战如此重要,各行各业的生产目的都是为进行“商战”服务的。

郑观应强调商战,但并不否定兵战之作用。他认为西方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商战与兵战的关系体现在富与强上,“能富而后能强,”只有具备了雄厚的基础,才能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力量,“非强不能保富”,只有“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才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富与强实相维系也。”^⑨ “国既富矣,兵奚不强? 窃恐既富且强,我纵邀彼一战,而彼族且怡色下气,讲信修睦,绝不敢轻发难端矣。”^⑩ 可见,商战与兵战是既相互联系,又共同促进、相辅相成的。

“商战”要求发展近代民族工商业和交通矿务等各种企业,不仅包括通商、贸易,而且包括工、矿、交通等整个工业体系。对于商业和工业的关系,郑观应说:“国家欲振兴商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⑪ 反复强调唯有发达的工业,才能有精美而低廉的产品与外国竞争。因此,他认为“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

① 《盛世危言·练兵下》,《郑观应集》上册,第 871 页。

② 《盛世危言·练兵下》,《郑观应集》上册,第 871 页。

③ 《盛世危言·民团下》,《郑观应集》上册,第 903 页。

④ 《盛世危言·边防二》,《郑观应集》上册,第 778 页。

⑤ 《盛世危言·边防一》,《郑观应集》上册,第 774 页。

⑥ 《盛世危言·边防六》,《郑观应集》上册,第 804 页。

⑦ 《盛世危言·商战上》,《郑观应集》上册,第 586 页。

⑧ 《盛世危言·商务二》,《郑观应集》上册,第 607 页。

⑨ 《盛世危言·商战下》,《郑观应集》上册,第 595 页。

⑩ 《盛世危言·商战上》,《郑观应集》上册,第 591 页。

⑪ 《盛世危言·商务五》,《郑观应集》上册,第 626 页。

可精。”反之,“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①这就是强调商战必须要有强大的工业为后盾,肯定发展工业是发展商务的前提。

但在当时,已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中国,在商战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下,仍“袭崇本抑末之旧说,……虽日日经营商务,而商务总不能兴”。^②为此,郑观应吁请清朝当局改变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大力发展本国商务,对抗列强的“商战”,把被外国资本主义所抢占的商品市场夺回来。如何进行商战?他说:“学西洋之制造,以抵御来源,仿中国之土货,以畅销各国。表里图利而国势日兴。”^③也就是说,一要仿造出口商品,抵制来源,二要出口土产,以广销路,以达到“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于中国者,皆可运售”^④的目的。这样,就能保护民族权益,堵塞利源外溢,收到富国裕民之效。

郑观应的“商战”主张,既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经济的愿望,更是一种爱国的政治主张。他与重本抑末思想针锋相对,提出了以商立国,建立以商务为中心的实业结构体系的主张,把仿效西方近代生产方式,振兴资本主义实业的意义提到救国救民的高度。这种救国思想对促进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就其本质而言,它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性质,是一种理想,是倡导者的善良愿望,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事实上,不是民族资本主义对帝国主义进行“商战”,相反的,在外国商品倾销的攻势下,许多民族企业倒闭。然而,郑观应毕竟是出自爱国之心,基于自己的职业能力,从社会的一个侧面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做了实在而有益的工作,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与抵御外国侵略相联系,这在当时无疑是爱国和进步的。他的商战思想,对于今天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有裨益。

三、变法自强,实行议会政治。

郑观应认为中国要富强,首先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改革的方案即是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他指出“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提出了设议院、伸民权、行选举,以求“君民一体、上下一心”^⑤的主张。

设立议院有何优越之处?郑观应认为,“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有议院,则“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首先,议会政治起了监督作用,“故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从而使国家走向富强。其次,“议院为国人所设,议员即为国人所举。”议会政治的选举制和封建的保举推荐制相比,更为优越一些。再者,议会政治是富强的本原。他认为“欲公法之足恃,必先立议院,达民情,而后能张国威,御外侮”。并说议院制在外国已经明效大验,英国行之于前而富强,日本步趋于后,勃然而兴。因此,中国要国富强兵,安内攘外,其途径“必自设立议院始矣!”

郑观应考究西方各国的历史,敏锐地看到西方国家的富强之本,不只在于船坚炮利,而且在于议院上下同心,“议院兴而民志合、民气强。”指出中国要对抗列强的侵略,非设议院而改革不可。强调中国“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

① 《盛世危言·商战上》,《郑观应集》上册,第588页。

② 《盛世危言·商务二》,《郑观应集》上册,第607页。

③ 《盛世危言·商务三》,《郑观应集》上册,第615页。

④ 《盛世危言·商务三》,《郑观应集》上册,第616页。

⑤ 《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11—312页。

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① 他的这种主张贯穿着变法自强维新救国的精神。无疑,西方议会制比起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是前进了一大步,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郑观应变从西法,向先进的资本主义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实行议会政治,其目的就是为了富强救国。政治制度的变革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得失盛衰,实行议会民主政治本身就意味着他的爱国思想的阶级内容有了本质的变化,即由传统的爱国思想向新的资产阶级爱国思想的转化。他或者著文宣传,或者禀促当局早日改革,实行立宪政体,成为中国近代最早宣传并主张中国实行议会政治的爱国思想家之一。

四、教育救国,学习西方。

甲午战后,中国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处境,主张教育救国的呼声很高,郑观应的教育救国思想就是比较突出的。郑观应认为科举制以八股文的优劣作为选士标准,造成学用脱节的不良风气,禁锢思想、消磨志气,甚至摧残身心健康,不少人成为无益于国无益于民的废物。因此,科举制是中国缺乏人材的根源,在他看来,要救国,就必须重视教育,培养人才。他主张改革科举制,废除八股文,向西方学习。他说:“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② 他的所谓西学,既指西方的“艺学”,即近代的自然科学与先进技术,又指西方的“政学”,即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学说。

他认为进行政治改革,如果不把引进政学放在首位,不先培养政治人才,不进行思想启蒙工作,一切改革都不能进展,自然科学也不会取得成就。他把兴教育视为政治制度变革的一个先决条件,认为伸民权,必先广民智,只有在“民皆智慧”之后,才可开设议院。否则,必然议不出是非,“徒滋乱萌”。他强调,西方能够实行公举议员是其国民的觉悟程度高,而我国民智未开,一定要进行民权思想熏陶,待“民皆智慧,而后所举之员(即议员)乃贤”。^③ 他在某种程度上已意识到政治上要改革,光靠造就一批政治专才还不够,还需要相应的政治土壤,即支持变法的社会基础,必须以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学”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

在他看来,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强盛,除了政治因素外,还在于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达。因此,他也重视学习西方的“艺学”。他说:“夫工艺非细事也”,“则小可开工商之源,大可济国家之用”,西方经济之所以发达,就是“根于工艺”。^④ 他渐渐意识到,科学技术是先进的生产力,而教育是实现这种生产力的重要工具。要使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就必须有赖于教育,通过教育,把科学技术传授给直接生产者,生产者掌握了科学技术,才能在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教育不仅传播文化科技,而且也促进了文化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与文化教育发达与否又表现在人才方面,因此,在中国进行近代化,必须重视技术教育以造就技术人才。

郑观应的教育救国思想在本质上是改良的,它片面夸大了教育的作用。实际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根本解决社会变革问题,只有革命。进步的教育虽然能推动政治斗争,但不能代替革命。而在社会上还没有比改良更先进的主张之前,主张教育救国,无疑也是进步的,革命固然重要,教育也不能忽视,社会不能一日无教育,教育具有历史的连续性与继承性,郑观应的教育救国主张,虽然救不了国,但也应该给予适当地肯定。^⑤

(收稿 1994-09-20;责任编辑 毛曦)

① 《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13—314页。

② 《盛世危言·西学》附论,《郑观应集》上册,第280页。

③ 《公举》(甲午后续),《郑观应集》上册,第329页。

④ 《盛世危言·技艺》,《郑观应集》上册,第719—720页。

⑤ 参见《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